

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当代文坛

有生活的“温柔”与“暴虐”——苏阳小说浅议

【作者】何同彬

任何小说家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与日常生活（或者说存在）的关系，这是一种先于小说意识而存在的“法则”，带有某种必然性和强制性。绝对地摆脱日常生活的各种艺术尝试，都是一种试图恢复想象力和人对神秘世界的虔诚敬意的努力，尽管它们已经在小说实验的场域内消隐了，但却不是这些试图击垮现实暴力的行为真的溃败了，而是生活的必然性和存在的本质性悖谬的显现，也是小说必须实现与现实的合理“应和”的某种诗学宿命。小说不是历史和哲学的附庸，它必须在生活的绵延中充当叛逆者和游离者，必须首先呈现为存在的光影，然后再用自己独特的力量摧毁这种光影的虚假，而不是先验地构建一个抽象的阐释网络和自足体系。只有这样，小说家才能以最低限度的介入形态来敞开生活固有的丰富诗意，才能真诚呈现生活的“温柔”面相。但是，只要是介入的都是危险的，因为生活对小说来说有着“与生俱来”的压迫和伤害的欲念，它时刻准备吞噬小说及其主体的观看与触摸，使之成为自己庞大而僵硬的躯体的傀儡。因此，一个小说家面对生活的时候所能够采取的“立场”和能够保持的合适距离就显得尤为重要，在叙事的丛林里一旦迷路，生活的“暴虐”就会如鬼魅般显现，消解和榨干小说的任何诗性与智慧，使之成为如今拙劣地模仿和扭曲生活的文学生产的一部分。在我看来，苏阳的小说恰恰生长在生活的“温柔”与“暴虐”的中间地带，有着一种独异的、但却又犹疑的品性，她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位置上开始了，但却不会在这一位置上“安全”地离开，她必须从犹疑的那种看似安全却饱含敌意的状态中解脱出来，才能最终与生活的“暴虐”彻底绝缘。

苏阳的小说美学呈现了某种多重置的模式，她轻盈地穿梭在多种小说传统的边界，但是却又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一个传统的“重复”，而是撷取了它们最为敏捷和透明的叙事策略，从而使得小说并没有因为这种多重性而显得繁复和臃肿。因此，初读苏阳的小说，你会被一种随性而冷静的气质深深吸引，你很难从一个“女”小说家的性别樊篱内框套苏阳小说的美学品质，也难以用任何“主义”来涵盖她的小说的艺术面貌，但你又清楚地知道，她是那么地“熟悉”，肯定是小说的历史的某种“再现”，她不是一个小说艺术的革命者，不是一个靠哗众取宠、标新立异来取悦“权威”的小说的投机主义者。在如今这样一个焦虑又急躁的文学时代，这种选择委实是有些“不合时宜”、不够“聪明”的，但正是这种超脱的小说意识决定了她的小说纯真又志诚的品性，决定了她成为一个生活的“温柔”诗性的“简单的”诉说者。

在苏阳那里，成为很多小说家终生障碍的“故事”被她轻易跨越，像一切成熟的小说家一样，她消解了小说对“故事”的依赖，拒绝了任何的潜在读者对环环相扣、跌宕起伏的情节的诉求，也不愿迎合那些“别有用心的”批评者等待拆解“故事”的捕猎者心态。小说叙述从一种虚妄的严谨和完整中解放了时间，“怀旧”再也不是一个刻意营造的、虚假的情绪化过程，而是成了一条萧洒、自然、静谧、随意的流动的小溪。在《我们的村庄》、《童花头》和《我的师傅金大力》这三篇小说中，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让人拍案惊奇、荡气回肠的故事，每一个小人物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开端、高潮、结局的“圈套”里，“故事”并非消失了，它们无处不在，但却不是一种突兀的、生硬的“在场”，而是闪烁在叙事的脉络之中，若隐若现。这也就是苏阳小说的叙事技巧的精妙之处。“故事”平淡了，而“故事”所依附的生活却更加逼真和亲切起来，叙事的脉络如一个波光粼粼的水网，没有一个奔流的方向，而是充盈而后进，把生活的真实面貌以一种更为流畅、自然的形态展现出来，更易触摸和亲近。“故事”被消解的结果却又是“故事”的精神架构的重建。

与“故事”一同解放的自然就是“人物”，苏阳小说中的人物让人“失望”，他们尽管以一种叙事牵引的角色出现在苏阳的小说中，但却仅仅是她叙事策略的一个迷局。当我们认为金大力、老周、闵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量[185]

评论数[0]

梳子将揭开一场“戏剧”的帷幕时，却发现他们总是在走向“传奇”的街角停下来，重新回到生活的“平庸”之中。最终，读者多半都会感到被愚弄，同时又会被这一愚弄的过程所吸引，因为人物并没有因“戏剧性”的消失而变得平庸，反而更加生动和亲切起来，毕竟生活不是一个个传奇的拼接，人物也不应成为小说愚蠢地玩弄生活的工具，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是我们不经意间忽略的细节与偶然。

生活的“温柔”面相，就是在苏阳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之中不断显现的，她力图恢复生活和生命互相缠绕、互相渗透，但却又缺乏激烈碰撞、总是在莫名中聚散的原貌。她总是把叙事的主体——“我”，隐匿在小说的文本背后，冷静而神秘地窥探着生活的流动和生命的翕张，然后像是一个奇妙的工匠，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戛然而止。生活和生命的偶然性、自在性却不是完全摒弃了苏阳的“介入”，她实际上是这一切的操纵者，她看似冷静和超脱，却在文本的间隙中散发着温情脉脉的情绪和会心微笑的神态。生活的“温柔”在苏阳小说散文化的特征中得到了彰显，她也并没有成为一个绝对的旁观者，但却因为其所处位置的相对“客观”，而放纵了生活的“欲望”，使得它的“暴虐”因此有了可乘之机，并且在苏阳的小说中铺张成为一种顽固而空洞的表象。

从某种层面上讲，苏阳的小说在小说传统的边界上徘徊，她拒绝对号入座，却没能实现自己的目的，她的向生活的“妥协”拖累了她的叙事进程，使之成为展示生活面貌的某种介质。尽管她试图显现一种不同于生活粗糙面相的“温柔”，但这一“温柔”却又仅仅是放弃省察和决裂的不等价的“报偿”。正如罗伯—格里耶对新小说的要求：追求一种彻底的主观性，这一革命性宣言看似绝对，实际上乃是切中了小说家们面对生活时的寡断和犹疑、充满不信任却又时时依赖的弊病。新小说或者说现代小说应该把鲜明的主观性放到第一位，因为单纯再现生活的媒介和方式的不断更新，已经剥夺了小说的这一功能，迫使它与生活对立起来，迫使它成为一个更能容纳想象力和虚构形式的艺术载体。小说家必须“介入”，要更加“介入”，这里的“介入”不是鲁莽地认同什么时代精神传声筒这样幼稚的历史性责任，而是强调一种更需力量与智慧的“介入”方式，要在小说中首先看到“我”，然后再看到生活，要让“我”永远毫不留情地压制生活，使之永远无法“暴虐”起来。如今，一个小说家更需要勇敢。在小说的世界中，我们不希望世界尚未敞开就已经闭合，或者说在一种罅隙的光影中苟存，不希望生活总是伺机凌驾于主体之上，把小说打扮得光鲜却又疲惫。

总而言之，苏阳的小说拥有自己的独特的美学品质，但我希望她能够超越目前的“安全”地带，把自己置入一个“危机四伏”的诗学境地，那里，生活更显示着自己本真上无法受到威胁的“温柔”，更能抵御那些裹挟着平庸面相的、欲望化的“暴虐”。

【原载】《西湖》2008年第9期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重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 庆
级研究中心，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 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 三

峡
学
院
文
学
与
新
闻
学
院
介
绍
重
庆
三
峡
学
院
文
学
与
新
闻
学
院
创

更多
加盟
信息

建于
1956
年，
已有
50余
年办
学历
史。
现任
院长
谢建
忠

[关于我们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意见反馈](#) | [投稿指南](#) | [法律声明](#) | [招聘英才](#) | [欢迎加盟](#) | [软件下载](#)

永久域名: www.literature.org.cn www.literature.net.cn E-Mail: wenxue@cass.org.cn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